

導言

大乘神學的理念

對於「大乘基督教神學」這個有點古怪的書名，曾有朋友說「很牛、很令人期待」，但筆者自知這個書名其實也很危險，因為它很容易招來一些不必要的誤解，因此筆者先在這裏說明一下，究竟本書所講的「大乘基督教神學」（簡稱大乘神學）究竟所指的是甚麼，而大乘神學又有甚麼性質及任務。

「大乘神學」（Mahayana Theology）一詞在當代西方學界的出現，主要是由於基南（John P. Keenan）的倡導。¹然而，若以大乘神學作為一種神學探討，它的旨趣是在於以大乘佛教的資源或視角為素材，透過與基督宗教（以下簡稱基督教）的比較，從而反思及討論相關的神學問題，而這是屬於比較神學（comparative theology）的類型。²就此意義而言，其實在基南之前，早已有一些基督徒曾經嘗試進行過相類似的探索，其中包括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³道風山基督教叢林的創設者艾香德（Karl Ludwig Reichelt, 1887-1952）⁴以及著名《聖經》學者斯特里特（Burnett

-
1. 對基南的討論，詳參本書第四章。
 2. 對比較神學界的討論，詳參本書餘論。
 3. Timothy Richard, 《高級佛教的〈新約〉》（*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Edinburgh: T & T Clark, 1910）。
 4. Karl Ludvig Reichelt, 《中國佛教中的真理與傳統：對中國大乘佛教的研究》（*Truth and Tradition in Chinese Buddhism: A Study of Chinese Mahayana*

Hillman Streeter, 1874-1937) 等。⁵

對於漢語學界來說，有關大乘神學的討論並非完全新鮮的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一些中國基督徒已曾經嘗試與中國佛教進行神學性的對話或說透過與佛教的比較來進行基督教神學的反思。⁶其中徐寶謙（1871-1955）更曾經提及「大乘基督教」，但他主要是以此作為一個口號來提出對基督教批判及改革，而未有正式進行一種大乘基督教神學的建構。⁷真正嘗試倡導大乘神學的要算張純一（1871-1955），只是他的思想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直至最近幾年才開始有比較仔細和深入的研究。⁸數年前，筆者曾與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鄧紹光教授展開一場有關大乘基督論的辯論。⁹此一辯論，除了引發香港神學院的蘇遠泰加入對大乘神學的討論外，¹⁰更引起中國大陸學界的關注，除有大陸學者對相關辯論作出評論及分析外，論辯雙方的一些文章更獲國內出版物全文轉載。¹¹此外，在二〇〇六年《道風》期刊曾出版「比較

Buddhism; trans. from the Norwegian by Kathrina van Wagenen Bugge;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2001)。

5. Burnett Hillman Streeter, 《佛陀與基督：對宇宙的意義及人生的目的的探索》（*The Buddha and the Christ: An Explor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Universe and of the Purpose of Human Life*; London: Macmillan, 1932)。

6. 詳參賴品超編，《近代中國佛教與基督宗教的相遇》（香港：道風書社，2003）；增訂版《佛耶對話：近代中國佛教與基督宗教的相遇》（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7. 參徐寶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4），頁42-48。

8. 詳參蘇遠泰，《張純一的佛化基督教神學》（香港：道風書社，2007）。

9. 對是次辯論的一個簡報及分析，可參陳家富、賴品超，〈漢語神學對巴特神學的接受〉，載《基督教文化學刊》17（2007），頁111-138；重刊於歐力仁、鄧紹光編，《巴特與漢語神學II——巴特逝世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香港：道風書社，2008），頁65-90。

10. 蘇遠泰，〈大乘神學的再思：回應鄧紹光博士的《從天台宗佛學看巴特的基督論》〉，載《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36（2004），頁215-226。

11. 參《基督教思想評論》5（2007），頁227-254；章雪富，〈迦克墩信經的詮釋與基督的罪性：評述鄧紹光與賴品超之間有關「耶佛」對話的討論〉，載《山道》8.2（2005），頁107-124。

神學」的專號，當中除了有多篇文章討論克盧尼（Francis X. Clooney）、弗雷德里克斯（James L. Fredericks）、南樂山（Robert Neville）等比較神學家的主張外，更有論文提出對大乘神學的反思。¹²換言之，漢語學界對大乘神學已有一定的討論，並且也是傾向於把它視為一種比較神學。本書基本上是依循此一進路，將大乘神學定位為一種比較神學來進行，就是透過與大乘佛教的比較，從而對基督教神學作出反思和討論。

一、為何研究大乘佛教

筆者嘗試從事這種跨宗教的神學活動，除了出於個人的學術背景與興趣外，也是考慮對這種神學探索對多方面的意義，其中包括：基督教與佛教的相互理解及對話、漢語神學的發展、漢語基督教研究的學術發展、對基督教的核心教義、尤其基督新教華人教會的主流神學的反思。

首先，從個人學術興趣而言，筆者嘗試從大乘佛學反思基督教的神學問題，並不否定也可以從其他宗教的視角來進行相類似的探討。事實上，筆者自己也曾參與基督教與儒家的對話，¹³並嘗試透過參考儒家的思想來探討基督教的生態神學；¹⁴而近年更多討論的，是基督教與佛教的相遇、比較與對話，當中既有外在的工作環境的因素，但更重要的仍是個人的學術興趣。就外在的工作

12. 賴品超策劃，「比較神學」，載《道風》24（2006），頁17-164；主題內之主要文章皆重刊於趙林、楊熙楠編，《比較神學與對話理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13. 賴品超、李景雄編，《儒耶對話新里程》（香港：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1）；賴品超編，《基督宗教及儒家對談生命與倫理》（香港：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2）。

14. 賴品超、林宏星，《儒耶對話與生態關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hegemony) 的問題，從而指出漢語學界就大乘神學的探索，也有可能對國際神學及／或宗教研究界作出貢獻。¹⁰⁴

六、結語

經過以上的討論，筆者嘗試對所要提出的大乘神學，作出以下數點說明。

首先，本書所提出的大乘神學，並不是一種嘗試對不同宗教進行所謂「客觀中立」的比較的宗教比較學，而是一種基督教神學的探討，並且在性質上是接近於比較神學而不是諸宗教神學。

其次，本書所提出的大乘神學，在方法與目的上，皆有別於本色神學。本書並不是企圖透過使用大乘佛教的術語，來取代西方的神學或哲學用語，從而表達一種「本色化」、「本土化」或「中國化」的神學，並期望基督教可因此而被大多數的「中國人」或「華人」所接受。它更不是要先建立一套大乘佛教的哲學框架，然後嘗試將基督教信仰套進去，從而建立一種本色化或佛教化的神學。筆者對本色神學的方法甚有保留，而筆者也明白到有些人會以本色化作為目的來進行大乘神學；筆者也不敢斷然否定大乘神學會有可能附帶此種功能，但這不是筆者的目的。

第三，本書所提倡的大乘神學基本上只是一種思想實驗，是一種以反思基督教信仰為目的的神學活動；它既不是嘗試表達某一現有的、糅合了基督教與大乘佛教

104. 此文初稿〈反思比較神學的方法論：從大乘神學說起〉，原為會議論文，宣讀於「第二屆華人學者宗教研究論壇：華人的宗教研究方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2011年1月17-22日）。

的宗教群體的信仰，更不是要提倡一種混合了大乘佛教與基督教的另類宗教。

第四，本書所提倡的大乘神學基本上是實驗性的，而不是系統性的。本書既不是一部神學大全可以包含或窮盡一切的神學問題，而各章之間也是不能連貫地組織起來成為一個神學系統。

第五，筆者個人是採取對漢語神學一種廣義而多元的觀點，認為漢語神學應有多元化的發展，既不認為只有文化基督徒做的才是漢語神學，更不認為只有重生得救並且加入教會的才有資格談神學。¹⁰⁵本書以「漢語神學的思想實驗」為副題，並不是要提出一種規範性的漢語神學，說漢語神學「應該」或「只能」是一種大乘神學；筆者只是提出一種非排斥性的建議說，漢語神學「也可以」嘗試採取用大乘佛教的資源去發展神學。

最後，筆者對大乘神學的理念，是有別於曾經倡導大乘神學的基南和張純一。張純一在他做基督徒的時候提出的大乘神學，主要是提倡使用大乘佛教的思想去表達基督教信仰，並以此否定及取代基督教的西方式表達，而這是接近本色神學的進路；至於他在皈依佛教後對大乘神學的討論，基本上是從大乘佛教的視角去批判及改造基督教，使基督教「進化」為大乘佛教。¹⁰⁶筆者對大乘神學的理解與張純一所提倡的，是在方向上的根本差異；相對來說，與基南的差異基本上只是在重點上。基南是集中在義理或哲學的層次，並且主要透過對典籍論著的研讀來進行，而不強調與活生生的佛教徒進行對

105. 賴品超，〈漢語神學的類型與發展路向〉，載氏著，《邊緣上的神學反思》，頁 115-134。

106. 參蘇遠泰，〈張純一的佛化基督教神學〉，頁 152-156。

話；此外，他是傾向於以大乘佛學為神學的工具，甚至毫不矯飾地直稱之為神學的僕婢；具體而言，基南的是透過印度的大乘佛學去反省及批判基督教的神學傳統。¹⁰⁷相對於基南之集中在大乘的「智慧」、尤其中觀及唯識之學，筆者更多欣賞的是大乘佛教的「慈悲」、尤其法華、涅槃、淨土等所突顯的普世性救渡。此外，相對於基南之集中關注如何借鑒大乘佛教，從而消解或克服希臘化的形上語言及實體式思維對西方神學的桎梏；筆者更為關注的，是如何使用大乘佛教的資源以發展漢語神學。筆者認為，這不單更合乎大乘佛教的精神，並且更也「對機」，就是更能配合漢語神學的處境。這是因為，希臘化的實體式語言主要是一西方語文、尤其印歐語系的語言，中文未必有相類似的問題，反而大乘佛教對普渡眾生的慈悲，也許更為有助於匡正基督新教華人教會的主流神學。

107. 詳參本書第四章。